

杜甫诗赏读

吕明涛 著

李永田 董希平◎主编

唐宋名家诗词赏读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

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

一览众山小。

线装书局

杜甫诗赏读

吕明涛◎著



Y
I207.227.823
2

唐宋名家诗词赏读

李永田 董希平 ◎ 主编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甫诗赏读 / 吕明涛著. —北京: 线装书局, 2007.2

(唐宋名家诗词赏读)

ISBN 978-7-80106-455-4

I. 杜… II. 吕… III. 杜诗—文学欣赏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1007 号

责任编辑: 于建平

封面设计: 亿点印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天则图书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香河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59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0.00 元 (全套十二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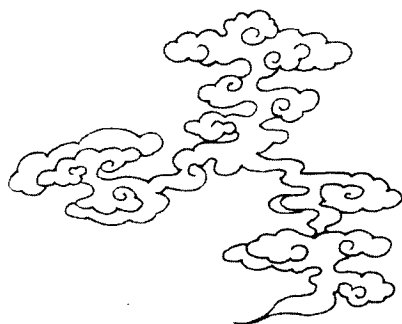
唐宋名家诗词赏读

主编：李永田 董希平

副主编：胡璟 赵亚丽 贺颖莉

《李白诗赏读》	纪 准
《杜甫诗赏读》	吕明涛
《白居易诗赏读》	张 黔 吕静平
《李商隐诗赏读》	邓 丹 陈芝国
《杜牧诗赏读》	陈 光
《李煜词赏读》	周仕慧
《柳永词赏读》	刘占召 张海凤
《苏轼词赏读》	沈耀峰 陆爱英
《李清照词赏读》	徐建委 刘 峥
《辛弃疾词赏读》	王明辉 王铭丽
《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》	李玉珍 王景明
《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》	李玉珍





序 言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。

对于传统的中国精英阶层，诗词创作是他们自识字就开始的人生必修课。他们自然而然地浸润其中，如同日常饮食。

古来圣贤无不善于此道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，既蕴涵着前贤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也浓缩着先人深邃的人生体悟：“何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”，显示出晋人刘琨对于更高层次人生境界的向往；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，透露出唐人李白对于人生流程奥秘的领会；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是宋人苏轼对于丰厚学识的自信；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是清人纳兰性德对于世情多变的无奈……很多诗词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、诗人独特的遭际下写就的，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历史背景、诗人的遭遇和情感，有很多还涉及更久远的历史典故、神话传说等。因而在诗词中，历史鲜活了起来，诗人的人生鲜活了起来。古典诗词以其深刻的思想、精练的语言往往成为孩童习字诵读的传统教材，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也占有相当的比重。

诗词是华美的，以致历经久远，仍被我们反复玩味，这也是诗

词的重要价值之一。而造成这种美的因素很多，其中诗人的真诚占了重要的份额。他们浓缩了深邃的体悟，用一生的执著写就了这美的诗章，诗人的生命之花绽放其中，可谓至诚。唯其如此，才流传千载而不昧，时时触动我们的心弦。

一卷古诗词在手，即可与千载之上的古人进行跨时空的心灵的沟通和对话，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，体味着“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”的境界。这种浸润心灵的阅读，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，应该也算得上一种“精神的化妆”，或者“心灵的美容”吧。这在“快餐文化”大行其道的今天，更有其特殊的意义。

本丛书分别从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杜牧、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李清照、辛弃疾共十位唐宋诗词名家的作品中，遴选其优秀者以成十部专辑。另外广泛撷取唐宋诗词名家精华之篇汇成两本合辑，一为《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》，一为《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》，一并呈献给读者。十位大家在唐宋两代诗词领域中，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代表性，再加上两本合辑尽搜名家名作，故本丛书足具唐宋诗词之大致面貌，观止矣。

本丛书特邀各高校学有专精的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的学者，精心编选。其中的注释力求详备准确，赏析文字力求流畅感人，雅俗共赏，其字里行间也渗透着编著者自己的研读心得和人生体验。因此，个中偏颇之见难以避免，所谓“见仁见智”是也。我们的初衷之一也正是在于抛砖引玉。

是为序。

董希平

杜甫其人其诗



杜甫的成就自然缘于他自幼卓尔不凡的诗才，缘于他笔耕不辍的勤奋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笔不懈，然而只有这些还不足以成就杜甫，杜甫亲眼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，并以一个传统士人的良知和敏感，把这个“万方多事”的时代摹画下来。所以说，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玉成了杜甫。

杜甫其人

杜甫，字子美，唐玄宗先天元年（712）出生于河南巩县南瑶湾村的一座窑洞里。这是一个世代“奉儒守官”的家庭，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，精通《左传》，文韬武略，杜甫常引为自豪。杜预是京兆杜陵人，杜甫曾在杜陵附近的少陵原住过，遂以杜陵为郡望，常自称“杜陵布衣”、“少陵野老”。杜甫的十世祖杜逊于东晋初年南迁至襄阳，任魏兴太守，为襄阳杜氏始祖，故有人称杜甫祖籍襄阳。杜甫曾祖依艺，任巩县县令，杜氏始迁居巩县。祖父审言，武后时官膳部员外郎，善为诗，“文章四友”之一。父闲，为兖州司马，终奉天县令。有这样一个家世，所以杜甫在《进雕赋》中称：“自先祖

恕预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。”又因其家世有擅诗歌的渊源，杜甫也颇以为自豪，称“吾祖诗冠古”（《赠蜀闾丘》），“诗是吾家事”（《宗武生日》）。

诗人自幼好学，七岁就吟诗、习字：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九龄书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”（《壮游》）诗人尝自言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，他称道友人“群书万卷常暗诵”（《可叹》），这也应视为是杜甫的夫子自道。杜甫除在早年积累了深厚渊博的书本知识之外，还接受了其他艺术形式的熏陶。他六岁曾在郾城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，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。诗人晚年在长沙遇到了流浪江南的大歌唱家李龟年，使他回忆起四十多年前，在洛阳曾听过李龟年的演唱，诗人当时还是一个孩子。有感于这段往事，诗人写下了被后人推为“千秋绝调”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。

杜甫的童年一方面在刻苦读书、吟诗、习字，另一方面，他也像其他孩子一样顽皮：“忆年十五心尚孩，健如黄犊走复来。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（《百忧集行》）可见杜甫从小就不是一个呆板的孩子。

开元十九年（731），杜甫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漫游，游览了江南许多秀丽山川、名胜古迹，甚至以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一游为遗憾。《壮游》有句：“到今有遗恨，不得穷扶桑。”（扶桑即日本）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，二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参加了科举考试。由于文章不合时宜，而被黜落，年轻的诗人并不太在意这次失利。落第的第二年，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漫游。这次漫游的地点在齐赵（今河南、山东、河北）一带，这一时期，诗人裘马清狂，呼鹰逐兽，非常快意。

如果说前两次的漫游，杜甫还略显涉世不深，那么，开始于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的第三次漫游，杜甫则多了几分成熟与自信，还有几分莫名的怅惘。这年，诗人三十岁。天宝三年（744），杜甫结识了李白和高适。三位诗人性格相近，情趣相投，同游梁园，登高怀古，郊游狩猎，访道寻幽，十分惬意。这年秋天，三人分手，高适南游楚地，李白探亲任城，杜甫则往兖州省父。

天宝四年（745），杜甫结束了自己的漫游，第二年，杜甫带着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，参加天宝六年

(747) 朝廷举行的制举。年近不惑的诗人本来志在必得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，嫉贤害能，排斥异己，制造了“无一人及第”的假象，还向玄宗上表称贺“野无遗贤”。

仕途受挫后，杜甫在长安不得不过着“卖药都市，寄食友朋”（《进三大礼赋表》）的生活，甚至屈辱到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。天宝十年（751）正月，玄宗举行祭太清宫、太庙、祀南郊的大典，杜甫写了三篇《大礼赋》投延恩匭。延恩匭制度是武后当政时建立的，士子通过献投赋颂，以求仕进。杜甫在前一年曾投过一篇《雕赋》，但投匭之后，寂然无闻。这次投匭，没想到竟得到了玄宗的赏识，令待制集贤院，命宰相识文章。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杜甫也颇为自豪：“天子废食召，群公会轩裳”（《壮游》），“忆献三赋蓬莱宫，自怪一日声辉赫。集贤学士如堵墙，观我落笔中书堂”（《莫相疑行》）。之后，就是无限期的等待，杜甫并没有等来朝廷的任命，生活却更为艰难了。直到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十月，杜甫在长安已困守了十年，才被任命为河西尉，旋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。这年十一月，安史之乱爆发了。十二月，判军攻陷东都（洛阳）。次年正月，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，进逼长安，六月九日，潼关失守，十二日，玄宗仓皇奔蜀。

面对这一急遽的变乱，杜甫加入到流亡的队伍之中。他先带着家人由奉先往白水，又由白水再向陕北逃亡。天宝十五年（756）七月十三日，李亨在灵武即位，并改元至德。杜甫此时已逃至鄜州，八月他得知这一消息，把妻小安置在羌村，只身投奔灵武，不料在途中为叛军俘获，被押解至长安。杜甫在叛军盘踞下的京城目睹了国破后的种种惨象，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。《悲陈陶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悲青坂》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。

至德二年（757）四月，杜甫冒险从长安逃至凤翔肃宗行在。“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”，这是杜甫朝见肃宗时的自我写照。五月，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。就任不久，便因上疏营救被罢相的房琯，而触怒了肃宗，君臣因此逐渐疏远。八月肃宗特许杜甫回鄜州探亲，实际上是有意疏远杜甫。九月，长安收复。十一月，杜甫举家迁往长安。仍任左拾遗，但终因房琯的牵连，于乾元元年（758）六月，被贬为

华州司功参军。

乾元二年(759)七月,杜甫弃官,携妻小由华州去往秦州。至于弃官的原因,“本传”以为因“关辅饥”,其实主要原因是杜甫对政治已感到失望,“恨无匡复姿,聊欲从此逝”(《送樊侍御》)。杜甫到秦州,并非盲目之举,按他的话说是“因人作远游”(《秦州杂诗》其一)。等到举家来到秦州,杜甫才发现无人可“因”。以致穷得不名一文,“囊空恐羞涩,留得一钱看”(《空囊》)。十月,杜甫和家人从秦州又投奔同谷,再一次“因人远游”。当在同谷遭到冷遇后,杜甫于当年十二月一日作计入蜀。乾元二年末,杜甫到达成都,次年春,在亲友的帮助下,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,一直居无定所的诗人,总算有了立身之所了。

代宗宝应元年(762)正月,严武以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来到成都。严武是杜甫的小友,也是好友,时常携酒到草堂与杜甫诗酒唱和。在严武的资助下,草堂有了较大的扩充,杜甫与家人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。同年四月,玄宗、肃宗相继去世,代宗即位,七月代宗召严武还朝。严武离开的这段时间,徐知道在成都作乱,杜甫带家人为避乱,由成都到绵州,辗转至梓州、阆州。广德二年(764)春,严武再镇蜀,杜甫才又回到了成都草堂。这次严武奏请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,并拉他做节度使署中的参谋。杜甫迫于友谊,只好“白头趋幕府”(《正月三日归溪上》)。但到了永泰元年(765)正月,杜甫还是辞职了。四月,严武卒。杜甫决定离开成都草堂。

杜甫离开成都后,经嘉州(乐山)、戎州(宜宾)、渝州(重庆)、忠州(忠县)、云安(云阳),于大历元年(766)到达夔州(奉节),由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,杜甫在这里住下了。杜甫在夔州共住了一年零八个月,这期间,他主管东屯的一百顷公田,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,又在瀘西买了四十亩果园,请了几个雇工,一起劳动。因为生活比较安定,杜甫得以大力写诗,“他乡阅迟暮,不敢废诗篇”(《归》)。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,总数有四百五十多首,几乎占杜集总数的三分之一,平均不到两天就写一首诗。诗歌内容不仅涉及夔州一带的风土人情、山川景物、名胜古迹,诗人还有意识地总结了自己的身世、经历,写了不少自传、传记体的诗歌。

大历三年（768）正月，杜甫思念家乡，于是乘舟出峡，这是诗人最后的一次漂泊。他先到湖北江陵。之前，他把妻小寄居在当阳三弟家，自己拟在江陵谋生。他在夔州曾寄诗给荆南节度使卫伯玉，到江陵后又去拜访了他，但卫只是以客礼待他。杜甫在江陵不断接到家人从当阳寄来的家信，诉说他们在当阳的贫困。杜甫把家人接到江陵后，本来就没有着落的生活，变得更加拮据了。杜甫此时需要更多的接济，也因此碰到了更多的冷遇。

这时的时局正是“万方多难”之秋，仅大历三年就有商州乱、幽州乱，紧接着西蜀也发生了战乱。杜甫不但不能北归，还被迫更南行。大历三年晚秋，杜甫携家离开江陵，南往公安，年底又漂到湖南岳阳，一直住在船上。大历四年正月，杜甫由岳阳到潭州（长沙），又由潭州到衡州，到达衡州，杜甫见到了韦之晋。韦在调往湖南的途中曾和杜甫在夔州见过面，杜甫有诗相赠（《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》）。大历四年二月，湖南军由衡州徙潭州，韦调任潭州刺史，他原拟引荐杜甫，邀杜甫一同赴潭，但不巧杜甫却病了，只好暂留衡州，这期间，杜甫得到了衡州判官郭受的关照。等他病愈复折回潭州，韦之晋忽于夏天病故。此时杜甫又有北归的打算了。

大历五年（770）四月，臧玠在潭州作乱，杜甫逃往衡州，原打算再往郴州投奔舅父崔伟，但行至耒阳，遇江水暴涨，只好停泊在方田驿，这里离耒阳县城陆路还有四十里，杜甫一家五天没有吃的。耒阳令聂某得知，便写信问候，并派人送去牛肉白酒，总算没有饿死。由耒阳去郴州，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，大水未退，再去郴州已无可能，杜甫改变计划，顺流而下，由耒阳折回潭州。就在这年冬天，杜甫死于由潭州驶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。诗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下绝笔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，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”，诗人至死仍念念不忘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。

杜甫所处的时代

唐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，儒、佛、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，这使得唐代的诗人，尤其是盛唐诗人，一人身上

能看出几种思想的影响。比如李白，除了受儒、佛、道三家思想的影响，还喜好纵横、任侠之术。杜甫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氛围之中，思想也不可能是单一的。杜甫早年曾一度醉心于道教，壮年以后又对佛教产生过兴趣，但他终身伏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是儒家思想。杜集中有诗《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》：“重闻西方止观经，老身古寺风泠泠。妻儿待米且归去，他日杖藜来细听。”因替妻儿谋食故中断听经，可见家人是杜甫遁入空门所不能割舍的。更何况，杜甫不仅割舍不下家人，他同样割舍不下朋友、国家、人民。即便是人生充满了苦难，艰辛，世间到处是冷眼与不公正，杜甫依然用一腔的热情去拥抱它。

人生与社会是儒家关注的对象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奔走列国，洒洒惶惶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采取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。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的杜甫也是这样，他对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，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。从青年时代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雄心壮志，到中年时代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抱负，等到垂暮之年时，诗人则把自己一生未能实现的愿望托付给友人：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（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》）杜甫坚守了一生的信念从来没有丝毫的懈怠。杜甫常思“致君尧舜上”，从君主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体现了强烈的忠君意识，“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难夺”，这一自白是杜甫忠君思想最好的概括。

另一方面，杜甫又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，杜甫的思想里有着很强烈的人民性因素。“忠君”和“忧民”，有时可以统一在一起，但在更多的情况下，两者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杜甫作为一个有着严肃的写实精神的诗人，必须面对这一矛盾。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再来读杜诗，就会发现诗人在诗中许多地方体现出的不得已、甚至拙于解释而显现出的语言的苍白与无奈。在《新安吏》中，开篇我们能感受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真实深切的怜悯之情，“白水暮东流，青山犹哭声。莫自使泪枯，收汝泪纵横，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”，“眼枯见骨”，“天地无情”，人民分明已走到了绝路，没有回旋余地可言了。运笔至此，诗人挽住了自己情绪的缰绳，将读者的视线转到了另

外的方向：“就粮近故垒，练卒依旧京，掘壕不到水，牧马役亦轻。况乃王师顺，抚养甚分明，送行勿泣血，仆射如父兄。”诗人左支右拙，竭力劝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。所说的话，杜甫恐怕自己都不能相信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《新婚别》，这首诗写一个刚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。一方面写出了新娘的悲哀：“君今往死地，沉痛迫中肠！”另一方面，又用比较多的笔墨来表现新娘的深明大义，她告诫丈夫：“勿为新婚念，努力事戎行！”尽管我们不能贸然否定新娘形象的真实性的真实性，但有一点很明确，杜甫所选择表现的形象、情感并非常态、常情，是他为服务国家利益所作出的选择，或者说是牺牲。

杜甫在谈到自己的遭际时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在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，诗人写到自己刚到奉先县家门，便得知幼子饿死的噩耗：“入门闻号咷，幼子饿已卒。”杜甫的殇子之痛很快被对他人、国家命运的担忧所取代，他首先用推己及人的方法想到了普通的百姓：“生常免租税，名不隶征伐。抚迹犹酸辛，平人固骚屑。”进而“默思失业徒，因念远戍卒。忧端齐终南，溷洞不可掇”。杜甫对自己的不幸也采取了这种非“常情”的处理方法，这也是儒家文化在杜甫思想情感中一个明显的体现。

艺术风格

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判，早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就已开始了。唐初，唐太宗、魏征等人也多次提出反对浮华文风的主张。但这些政治家的着眼点在于政治而非文学，他们关心的是绮靡文风常常是朝政混乱、国家覆亡的祸端，而不是在遵循文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，探讨文学该如何发展。这正可以解释唐太宗何以一面批评南朝文风，一面写作辞采华艳的诗歌。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批判六朝文风始于“初唐四杰”。杨炯在《王勃集序》中批评初唐诗坛受六朝文风的影响而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”。至武后垂拱年间，陈子昂在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中，将批判的对象明确地界定为“齐梁间诗”，并在批

判的同时，将“汉魏风骨”确立为后人效仿的典范，陈子昂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杜甫高度评价了陈子昂的这一功绩，“有才继骚雅，哲匠不比肩。公生扬马后，名与日月悬……终古立忠义，《感遇》有遗篇。”（《陈拾遗故宅》）像陈子昂一样，杜甫也非常重视建安诗歌。杜甫早年就“诗看子建亲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》），晚年，赞扬高适诗歌“方驾曹刘不啻过”。以建安诗家自许与许人都说明了杜甫诗论的价值取向。

与陈子昂不同的是——或者说，见识超出陈子昂的地方在于——杜甫并没有简单地将“齐梁间诗”一笔抹杀、全盘否定。而是采用“转益多师”的态度，对“齐梁间诗”区别对待。批评者从诗歌内容卑弱的角度否定齐梁诗歌，杜甫则从诗歌艺术的角度，给予南朝诗歌以高度的评价。声律是南朝诗歌对中国诗歌史的重要贡献，这一贡献却淹没在人们对六朝诗歌的否定声浪中。李白向汉乐府学习，而对一脉相承的南朝诗歌基本持否定态度：“梁陈以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……寄兴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，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。”（见孟荣《本事诗·高逸第三》）在李白的诗作中，很少见到律诗。

杜甫则不然，他不仅在论诗中重视律诗的写作“遣词必中律”（《桥陵诗三十韵》），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（《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》），同时，杜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，在律诗的写作上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流传后世的杜甫诗歌总计一千四百五十八首，其中律诗（包括排律）就有九百一十六首，占总数的大半。尤其在七律的写作上，杜甫更是超迈前贤，并为后人制定法式。另外，在五言排律的写作上，由于受乃祖杜审言《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》的影响（此诗曾得到李邕的激赏），杜甫特别钟情于这种文体，在杜集中，五言排律竟有一百二十七首之多。总之，杜甫对待六朝诗歌的这种通达的态度，在前哲时贤中确属少有。

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丰富多彩，但为历来论杜诗者所公认的是“沉郁顿挫”，“沉郁顿挫”原是杜甫的自我评价：“臣之述作，虽不能鼓吹六经，先鸣数子，至于沉郁顿挫，随时敏捷，扬雄、枚皋之徒，庶可企及也。”（《进雕赋表》）所谓“沉郁”，指的是诗思的深刻与感

情的凝重、苍凉。李白曾作诗戏赠杜甫，状其吟诗之苦：“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（见孟棻《本事诗·高逸第三》）此诗极有可能为后人伪托，但杜甫本人并不讳言自己吟诗之苦：“陶冶性灵存底物，新诗改罢自长吟。孰知二谢将能事，颇学阴何苦用心。”（《解闷十二首》之七）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（《江上值水如海势，聊短述》）这些诗句足以说明杜甫作诗用思之深且苦。

梁启超曾称杜甫为“情圣”，说明了杜诗长于抒情的特点，杜诗用情之深沉、悲凉，一方面缘于杜甫之性情，另一方面也由于杜甫生活在一个“万方多难”的时代，诗人亲眼目睹了亲友的离散、遭受战乱蹂躏的百姓，他用自己悲悯之心去感受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，发而为诗，诗中所展现的情感不能不深沉，不能不苍凉。以上两个因素构成了杜诗沉郁的特点。

所谓“顿挫”，主要指杜诗语言和韵律收放节制、纡徐曲折、势缓而沉、抑扬有法。并非波澜不惊、平滑流转、任情奔放。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在于杜甫是一个忧乐俱过于人的人，其情感之跌宕起伏亦非常人所能比。但是，杜甫又是一个受儒家伦理约束甚深的人，这使得他常常处于焦虑和矛盾之中，情感的表达也非李白式的酣畅淋漓，而呈现一种有力度却又受控制的状态。可见，儒家诗教在型塑杜诗的过程中，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后世影响

杜甫的诗名并非生前所得，大历四年（769），杜甫去世前一年，写诗《南征》，其中有句：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。”诗人写诗一生，到头来却感叹未见知音，其中况味，远非凄凉所能形容。不过这的确是杜诗在当时的实际境遇。当时几个重要的诗歌选本，如殷璠的《河岳英灵集》、高仲武的《中兴间气集》收诗年代都涵盖了杜甫的一生，但其中却不见杜甫的作品。可见，杜诗的确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。

杜诗被人发现，是中唐以后的事。中唐诗坛的两个诗歌流派——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的创作风格相差很大，但都一致推尊杜诗。元

稹率先总结了杜甫乐府诗“即事名篇，无复傍依”的特点，白居易更在比较了李白与杜甫后，流露出扬杜抑李的倾向，引发了后世旷日持久的李杜优劣之争。韩愈则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可见，中唐以后，杜甫的地位已足以和李白、王维分庭抗礼了。晚唐的李商隐与杜牧，人称“小李杜”，二人也一致认为杜甫是有唐一代最为杰出的诗人。

宋初诗坛，初学白居易，而后西昆体又以李商隐为模仿对象，但最终归宗于杜甫。《蔡宽夫诗话》“宋初诗风”条云：“杜子美最为晚出，三十年来，学诗者非子美不道，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。李太白而下，殆莫与抗，文章隐显，固自有时哉！”有宋一代，凡有影响的诗人，如王禹偁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人都称道过杜诗，并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杜诗的影响。逮至南宋，家国之恨更能够使文人在杜诗中找到共鸣。陆游、刘辰翁、文天祥等人也纷纷学杜诗、选杜诗、注杜诗。

元明两代，出现了大量的批选杜本。有清一代，集前人研究杜诗成果之大成，在杜诗的注释、校勘、考证、评论等方面，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总结性著作，如王嗣奭的《杜臆》、钱谦益的《杜诗笺注》、朱鹤龄的《杜诗辑注》、黄生的《杜诗说》、卢元昌的《杜诗阐》、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、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等。这是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古代诗人所没有享受到的荣誉。



目次

序言	1
杜甫其人其诗	1
登兖州城楼	1
房兵曹胡马	2
望岳	4
画鹰	5
春日忆李白	6
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	8
饮中八仙歌	12
同诸公登慈恩寺塔	15
兵车行	17
前出塞（九首选一）	20
曲江三章章五句	21
丽人行	22
醉时歌	25
九日寄岑参	27
秋雨叹（三首）	
雨中百草秋烂死	29
阑风伏雨秋纷纷	29
长安布衣谁比数	29
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	31
后出塞（五首选一）	36